

# 新形势下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郭新昌<sup>1</sup>, 张庆友<sup>2</sup>, 万 晋<sup>1</sup>

(1.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2.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是立足国家总体安全战略、服务于新安全格局构建的高阶能力,具有宏观统筹性、长远前瞻性与跨域协同性,是大国安全博弈的重要支撑。新形势下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数据安全等共同构成了国家生存与发展最基础、最易受攻击,同时也是大国竞争最激烈的战略枢纽集合。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能力作为一个战略系统,主要涵盖国家安全战略预防能力、战略响应能力、战略统筹能力和战略革新能力。基于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根本性和关联性三维评估框架,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包括:粮食安全应加强战略预防能力、资源与科技安全强化战略革新能力、数据安全激活战略响应能力,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各领域战略统筹能力,以形成国家安全战略合力。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6)05-0019-13

##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in several key fields of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GUO Xinchang<sup>1</sup>, ZHANG Qingyou<sup>2</sup>, WAN Jin<sup>1</sup>

(1. School of Marx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in key fields". As high-level capabilities rooted i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ser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in key fields feature overall macro planning, long-term foresight and cross-domain coordination, and serve as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major-country security games. Against the new situation, food security, resource secur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data security and other fields jointly form a cluster of strategic hubs that underpin nation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re most vulnerable to risks, and witness the fiercest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constitute a strategic system mainly encompass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prevention capability, strategic response capability, strategic coordination capability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e urgency, fundamentality and relevance of risk impacts, the optimization paths for building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in several key fields in China are specified as follows: enhance strategic prevention capability for

**作者简介:**郭新昌(1980—)男,山东昌乐人,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军事教学部主任,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通信作者:万晋。

food security, strengthen strategic innovation capability for resource and sci-tech security, and stimulate strategic response capability for data security. On this basis, comprehensively boost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capability across all fields to forge synergy 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Key word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key fields; national security capacity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重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核心原则,明确提出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的目标,强调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这一部署深刻契合新形势下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与风险生成逻辑,是对国际安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等全球性挑战的系统谋划与主动回应,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伴随东西方经济竞合格局的深度调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以及逆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演进,国家安全领域正经历系统性变革。逆全球化的持续演化所导致的低增长和高保护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放大了全球经济体系相互依赖的脆弱性,进而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动用国家权力收缩关键产业,以“国家安全”为幌子为贸易霸凌主义辩护,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sup>[1]</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新的复杂态势。

当前复杂国际形势所引发的深刻变局已不再局限于经贸往来层面,而是加速演化为跨领域、多维度交织的复合型系统性风险,深刻重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整体格局。一方面,粮食资源供给、科技自主创新、跨境数据治理等深度嵌入全球发展体系的关键领域,日渐成为大国博弈与规则竞争的前沿阵地,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发展利益必须牢牢守住的战略重点;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对安全概念的泛化解读与功利化滥用,进一步提升了国家安全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博弈权重,也促使我国更加主动研判新形势下国家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特征、新挑战,将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纳入优先议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把捍卫

政治安全摆在首位。<sup>[2]</sup>”

目前学术界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涵盖 20 个领域的国家安全范畴,且其内涵与外延仍在不断拓展。在理论研究层面,不同学者从多元视角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展开了深入探索。王逸舟<sup>[3]</sup>从研究方法层面出发,提出“安全化分析”与“层化研究法”,提醒学界警惕国家安全研究的“泛安全化”陷阱,主张以地质层理式的分层视角拆解不同领域安全问题的内在逻辑,为界定重点领域的边界与优先级提供了方法论支撑;阎学通<sup>[4]</sup>立足国家利益视角,构建了效用分析法下的国家利益优先次序框架,其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政治领导类型纳入国家安全分析,为研判科技、经济等重点领域安全与大国战略博弈的关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当前学界对国家安全能力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理论积累,但针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的专门探索仍较为匮乏,且普遍存在能力层级界定模糊的问题。在国家安全能力的整体研究层面,已有成果从多维度展开了体系化剖析。唐永胜<sup>[5]</sup>指出国家安全战略能力的形成、积累和运用,实际上是国家能动地调度、使用资源与实力,达成战略目标,维护和实现国家生存利益的过程;王秉<sup>[6]</sup>聚焦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结合不同安全场景,探讨了应急处置、风险防控等基础能力的组合模式与优化方向;黄大慧<sup>[7]</sup>构建了国家安全能力的过程机制分析框架,从动态运行视角拆解了能力从生成、传导到落地的全过程逻辑。还有学者从资源配置、制度保障等维度拓展了国家安全能力的研究范畴,形成了多视角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安全能力的宏观剖析,既缺少对重点领域的针对性解构,也未对能力的层级进阶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往往将

侧重日常风险应对、实操层面保障的常规安全能力,与服务于国家全局战略的高阶能力混淆。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是常规安全能力基础上的进阶形态,主要目标是锚定国家总体安全战略,衔接中国式现代化长远发展需求,整合各领域安全资源、协调跨领域安全诉求,形成服务于新安全格局构建的系统性能力合力。本文系统探讨新形势下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的构成要素,结合其风险特质,提出差异化的能力建设优化路径,旨在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 一、新形势下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的理论建构

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的理论建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重点领域的边界与属性界定,二是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的内涵解析与要素拆解。

#### (一)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

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呈现显著拓展趋势,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sup>[8]</sup>。这些领域既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又直接关联国家主权捍卫、人民福祉保障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国安全博弈的必争场域。

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是涵盖国家生存根基、发展命脉与核心利益的有机安全集合体,各领域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彼此否定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任一领域的安全短板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强化的治理原则。本文聚焦粮食、资源、科技、数据等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若干重点领域,探讨其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路径。

本文聚焦上述四大领域,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并行演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攻坚的特殊语境下,必须高度重视其战略能力建设所凸显的安全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生存与发展最基础、最易受攻击,同时也是

大国竞争最激烈的战略枢纽集合;第二,在贸易保护主义与对华遏制行经之下,这四大领域最易被“武器化”,成为“卡脖子”与战略博弈的前沿焦点;第三,四大领域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风险传导的有机整体。全球化使粮食、资源、科技、数据成为具有跨国传导特征的共性安全议题,逆全球化态势进一步推动其安全风险泛化蔓延。四大领域兼具底层基础性、发展兜底性、全域联结性,不仅属于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更具备极强的风险外溢与联动效应,极易引发风险交叉积聚、连锁共振,最终加剧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风险的滋生、蔓延与扩散。

#### 1. 粮食安全

在2013年、2017年、2020年和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以及在湖南、广西等地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sup>[9]</sup>。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频发、全球性气候问题加剧多重压力叠加下,中国粮食安全的内涵已远超传统解决温饱的单一逻辑,成为集产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于一体的多层次、系统性战略工程<sup>[10]</sup>。历史经验表明,粮食供应短缺极易引发物价暴涨、社会动荡,甚至动摇政权根基。在全球变暖、地区冲突加剧、去全球化、疾病蔓延等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sup>[11]</sup>。受此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约束日趋严峻且机理复杂。

全球粮食分配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推动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与国家政策交织为典型特征的新型风险源。一方面,全球粮食供应链呈现区域化、政治化的异化特征,主要体现为国际资本力量与主产国政策的双重干预。近70%的全球粮食贸易被美国ADM、邦吉、嘉吉、法国路易达孚等少数跨国企业和资本所垄断,利润分配向资本与上游高度集中<sup>[12]</sup>。他们通过期货市场将粮食高度金融化,显著放大价格波动并主导贸易流向;与此同时,俄罗斯、乌克兰、印度、越南等主要出口国频繁以保障国内安全或稳定物价为由实施临时性出口管制,从供给侧制造稀缺性。两者叠加,使得粮食

供给稳定性深度受制于非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我国粮食安全对外部市场存在某些品种结构依存度高与物流通道集中的双重脆弱性。在品种结构上,大豆等的产需缺口显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2025 年,大豆进口总量分别占国内生产总量的 511%、589%、446%、485%、509% 和 524%<sup>[13]</sup>,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逆全球化进一步使其成为国际风险向国内传导的关键节点与放大器。在物流体系上,进口粮食依赖少数关键海运通道,易受域外大国博弈及沿岸政局变动的影响,供应链韧性持续承压。在逆全球化浪潮下,此种脆弱性有增无减,在国际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与供应链掌控力均面临严峻考验,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更趋错综复杂。

## 2. 资源安全

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充足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及资源性产品的状态,以及维护这一安全状态的能力<sup>[14]</sup>。资源安全的核心要义是保证各种重要资源充足、稳定、可持续供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资源的构成包括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sup>[8]</sup>。在新形势下,各类技术革新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凸显。智能技术、能源技术、高端制造技术等多个领域均对锂、钴、稀土、镍、铜等战略性矿产资源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受地缘集中性与市场分散性双重因素的制约,矿产资源安全治理呈碎片化和阵营化趋势<sup>[15]</sup>。能源安全也面临地缘政治博弈、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能源资源与矿产资源的可获得性与供应稳定性,共同构成资源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最大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消费国和能源消费国,我国对锂、钴等关键矿产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在新形势下暴露出显著脆弱性。一方面,主要资源和能源出口国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收紧出口配额、推动资源国有化等手段,强化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权;另一方

面,国际资源与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以及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源联盟”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与市场排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资源安全的外部压力。近年来,我国分别针对矿产和能源安全采取系列举措,初步形成“国内保障+国际合作”的双轨模式。面对新形势下全球治理规则的调整,我国仍需在定价权、技术标准、供应链管控等方面持续发力。

## 3. 科技安全

科技安全是指科技体系完整有效,国家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国家核心利益和安全不受外部科技优势危害,以及维护科技持续发展的能力<sup>[16]</sup>。科技安全属于非传统国家安全概念,如今逐渐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战场。科技安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科技安全侧重于国家科学技术系统自身的安全性,广义上的科技安全还包括国家以科技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新形势下科技安全更加显现出广义上的特征。科技安全风险是指危及国家科技安全状态的事件发生概率<sup>[17]</sup>。我国科技安全正面临外部技术封锁与内部科技断链的双重挑战,突出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这也是当前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主要隐患。

外部风险集中体现为西方大国的技术围堵与科技断链,这是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最直接威胁。例如,美国 2022 年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强化其自身供应链安全并遏制我国技术发展,其打压重点明确指向半导体产业,通过限制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试图切断我国半导体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科技断链,进而危及我国科技安全与产业安全。外部打压的持续升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科技安全的核心短板,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断链问题。当前,我国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高端元器件、高端光刻机等关键核心领域,仍高度依赖进口技术和产品,成为明显的“卡脖子”瓶颈,一旦外部供应中断,将直接导致相关产业停摆,严重危及国家科技安全与经济社会稳定。2024 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

投入的比重仅为6.3%,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平均水平,导致创新能力不足,难以从根本上破解科技断链风险<sup>[18]</sup>。此外,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我国还面临高端人才短缺、核心技术专利受制于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安全风险。从国际博弈来看,实现科技安全是应对西方技术霸权、破解“卡脖子”困境的关键,更是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支撑。新形势下,我国若能在西方严密封锁的集成电路、工业软件、高端元器件等领域实现战略性突破,将能有效破解外部技术围堵,争得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 4. 数据安全

随着数字经济深度发展,数据已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坚持安全可控,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培育发展新型要素形态”<sup>[19]</sup>。在此趋势下,数据安全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重大议题<sup>[20]</sup>。逆全球化背景下数据领域的安全风险日益凸显,数据泄露、非法贩卖等重大数据安全事件频发<sup>[21]</sup>,原始数据、统计涉密数据的安全隐患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直接关乎国家总体安全。

当前,我国数据安全正面临多重突出问题,且在多个重点领域呈现差异化、针对性的安全风险。在人工智能领域,主要面临三大风险:一是数据泄露风险;二是数据滥用风险;三是数据违规跨境流动风险。在超算领域,因涉及海量机密数据存取和计算,安全风险尤为突出,包括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相关机密数据泄露风险、数据高性能存储风险、数据流通效率低、计算性能和自主创新风险等<sup>[22]</sup>。在金融领域,关键数据安全成为持续影响金融科技企业最主要的网络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数据丢失风险、数据泄露风险、数据完整性风险等。据《2018—2019年度金融科技安全分析报告》<sup>[23]</sup>显示,在金融企业中,针对客户资料及企业重要业务数据的安全事件成为发生频率最高的安全事件类别。此外,我国在工业数据、医疗等领域亦存在数

据泄露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风险等,多领域数据安全风险的交织叠加,进一步影响国家数据安全战略的实施。

#### (二) 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的构成要素

国家安全治理强调系统性和综合性。借鉴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希斯(Robert Heath)于1986年首次提出的4R危机管理模式。希斯<sup>[24]</sup>认为危机管理不仅要包括事前、事中、事后方面的管理,还应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控制危机的产生,并用“4R”模式进行了总结,包括:缩减力、预备力、反应力、恢复力4个阶段。危机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基于危机症候学与动态发展视角,通过辨识与掌握不同阶段突发事件的多样化特征,采取相应管理办法<sup>[25]</sup>。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亦需覆盖危机管理的全周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能力可以分为战略预防能力、战略响应能力、战略统筹能力和战略革新能力。四大能力是深度耦合、循环递进的有机整体,构筑起动态适配的国家安全能力网络,共同影响着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态势。

##### 1. 国家安全战略预防能力

战略预防力是国家安全能力体系中危机前置治理的基础能力,是国家安全工作的起点。战略预防能力要求对国家安全环境中的潜在风险、非传统威胁进行前瞻性监测与系统性预警,以实现风险早识别、威胁早处置,将逆全球化衍生的安全挑战遏制于萌芽阶段。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要求在危机管理中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战略预防力正是这一理念在能力层面的具象化。遵循“信息获取—风险研判—行动预警”的内在逻辑,以实际安全问题为导向,战略预防力可进一步划分为两大维度。

第一,监测力。监测力是战略预防力的基础,指通过技术赋能与人力网络,对重点领域安全态势进行全时动态感知的能力。在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中,有效的安全监测被普遍视为谋划与行动的基石与前提。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sup>[26]</sup>在研究

中指出,“对安全环境的持续感知是国家规避生存威胁的前提,缺乏动态监测的安全治理如同‘盲人摸象’,终将陷入被动应对的困境。”从过程机制视角深化分析可见,在现代安全威胁多呈跨域渗透、多维交织特征背景下,监测力更应被视为整合物理、网络与社会多维空间的前置性能力,其水平高低可通过监测范围的全域性、采集时效的实时性以及数据真实性的去噪程度加以系统衡量。

第二,预警力。预警力是连接监测力和战略响应力的重要环节,也是监测预警能否成功的关键。预警力是指,治理主体基于监测数据,对风险进行动态整合与分级预警,并据此触发前置防控行动的能力。这里所指的预警,并非以减灾抗灾为目标的公共安全风险预警,而是立足新形势、针对安全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预警。这类风险兼具隐蔽性、突发性与随机性,使得事前预警实践面临挑战,难以进行常规定级,往往高度依赖于对其危害性的先期研判,再据此开展分级预警,进一步加剧了预警能力建设的难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sup>[27]</sup>要求“根据国家安全风险程度,及时发布相应风险预警”,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强调了预警力建设的重要性。

## 2. 国家安全战略响应能力

战略响应能力是国家通过其既有的安全领导体制、政策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对重大风险与威胁进行战略决策、政策执行和应急处置的系统性能力。

第一,战略决策力。战略政策体系为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战略谋划提供制度平台,在此制度基础上形成国家安全决策能力<sup>[10]</sup>。冷战后,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为核心构建集中统一的战略决策体系,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战略选择,其优势在于通过集中统筹实现风险决策的权威性与高效性。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作为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sup>[8]</sup>,为战

略决策力的落地提供了顶层设计支撑。新形势下国际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虽增加了决策落地难度,但并未动摇集中统一领导下战略决策发挥的效能。

第二,政策执行力。执行力的有效发挥既是制度完善的体现,也是技术支撑的结果,集中聚焦于危险发生后的事中响应环节。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关键执行主体,通过事前构建的风险防控预案、事中的快速响应机制与资源调配体系、事后的复盘优化流程,形成全链条执行闭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sup>[8]</sup>。这一要求为执行力建设明确了方向,既依托制度规范确保执行的规范性与协同性,又借助技术赋能提升执行的精准度与高效性,确保战略决策能够快速转化为应对风险的实际行动。

第三,应急处置力。应急处置力是危机事件发生后,以快速止损、态势管控、次生风险防范为核心目标,统筹多元主体与手段化解安全危机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的实际效果。国家安全风险呈现跨域耦合、多点触发、链式扩散的复杂特征,对处置力的协同性、精准性与高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应急处置力的有效发挥,需从三个方面系统着力:其一,在主体协同层面,需建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心、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地方政府属地落实、科研与市场主体技术支撑的制度化协同处置格局,依托扁平化指挥体系实现跨领域、跨区域快速联动;其二,在手段运用层面,需构建行政、法律、技术、经济多元化处置工具矩阵,针对不同风险类型精准施策;其三,在场景适配层面,需立足粮食与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科技、数据等重点领域的风险特质,制定差异化、场景化处置预案,强化实战化演练,确保处置措施与风险场景精准匹配。从实践评估维度看,应急处置力的效能可通过事态控制时效、损失降低幅度、次生风险阻断效果三大核心指标衡量,其直接目标在于危机发生后快速遏制局势恶化,最

大限度降低对国家主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福祉的损害,为后续安全秩序恢复与长效治理创造有利条件。

### 3. 国家安全战略统筹能力

国家安全战略统筹能力是指国家在维护安全过程中,平衡发展和安全关系、协调各领域安全诉求、整合各类资源要素的系统性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动态平衡的关键支撑。加强国家安全战略统筹能力建设,是我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推进的重要路径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sup>[28]</sup>,国家安全战略统筹能力正是这一重要论述的实践体现。

第一,协调力。协调力是破解国家安全领域中多重结构性张力的系统性能力,其核心在于通过战略统筹与系统集成,实现发展和安全、各领域安全、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三大关系的动态平衡与有机统一。在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层面,需构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良性循环。具体而言,高质量发展不仅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战略韧性,其过程本身也必须嵌入完善的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确保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系统性防范与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在各领域安全的协同治理层面,要求建立常设性的高层次跨部门协调机制与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制度化设计明确权责、整合资源、统一标准,从而对各领域交织叠加的复合型风险进行一体化研判与联动式处置;在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协调上,应深入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深层安全意涵。维护国内安全稳定是参与和塑造国际安全秩序的根基,主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合作,是反哺国内安全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这种“以内促外、以外固内”的辩证实践,是在复杂相互依存时代,实现国家核心利益与履行大国安全责任相统一的理论自觉与战略路径。

第二,资源配置力。资源配置力是战略统筹力的物质基础,指国家根据安全战略优先级,科学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科技等各类资源的能力。

其核心是建立“需求导向、精准高效、动态调整”的资源配置机制,确保资源向关键安全领域倾斜。在人力配置上,打造专业化国家安全人才队伍,整合军队、公安、应急、科研等领域人才资源,形成跨部门、跨学科的人才协同网络。在物力配置上,构建“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与产能储备相衔接”的国家安全物资储备体系,针对不同安全威胁优化储备品类与规模。在财力与科技资源配置上,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安全领域的投入力度,如设立国家安全科技专项基金,支持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技术研发。通过科学的资源配置,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 4. 国家安全战略革新能力

国家安全战略革新能力是国家安全体系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针对新形势下安全威胁迭代升级、风险形态动态演化的动态适应能力,体现为国家主动优化战略理念、重构能力体系、迭代应对策略的动态演进过程。当前,安全威胁的迭代升级与风险形态的跨界演化,要求国家安全战略革新能力必须保持动态演进与持续优化。

第一,创新力。创新力是国家安全战略革新能力的核心动力源,其核心构成与关键支撑体现为战略创新,即聚焦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布局的突破性创新能力,直接决定战略进化力的建设水平与演进效能。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式创新现代化以自主性为核心,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原则下推进技术—产业—制度协同演化,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传统技术发展理论的中国特色<sup>[29]</sup>。而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因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关乎发展全局,且面临逆全球化下的技术封锁与大国博弈,更需严守这一自主性原则,严防关键领域丧失发展主动权。创新力的强弱不仅关乎战略进化力的迭代速度,更决定国家安全体系能否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的跨越式变革,是维系国家安全体系长效韧性的底层支撑。

第二,优化力。优化力是战略革新能力的实践路径,强调对现有国家安全体系的动态调整与

持续完善。从运行逻辑来看,优化力以安全威胁的演化特征为导向,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能力布局与治理工具的相互协调。在体系优化层面,针对当下风险跨域耦合特征,重构国家安全治理架构,打破部门分割与条块壁垒,强化中央与地方、不同领域、国内与国际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型;在策略优化层面,基于安全态势的动态变化,定期开展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效果评估,结合重点领域风险演化新特征调整资源配置方向与政策工具组合;在实践检验层面,建立国家安全体系优化的常态化反馈机制,依托重大风险应对实践、模拟演练场景等,检验优化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始终与逆全球化下背景的安全环境、威胁形态、治理需求相适应。

## 二、新形势下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

推进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和提升国家安全保障水平的必由之路,因此,在结合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特质与战略能力构成要素基础上,科学明确能力建设优先级的判断依据与适配关系,才能针对性提出新形势下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优化路径。

### (一) 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的判断依据

由于不同安全风险的紧迫性、对国家核心利益影响的根本性以及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存在显著差异,战略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必须建立清晰的优先级。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的判断,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其中,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根本性以及关联性是三大核心维度。

#### 1. 风险影响的紧迫性

在通常的理解中,风险被界定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即个人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包括健康、安全、财产、环境等)可能遭受损害或面临负面影响。风险影响的紧迫性体现在这种可能性具有强烈的时间限度。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存在的语境下,安全威胁从潜在状态向现实危机转化的时间

阈值短,危机爆发后对特定领域安全的即时冲击强度大。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是国家安全能力优先级判定的前提性依据,主要表征为通过揭示威胁演化的时间节奏与破坏能级,来决定国家安全战略中预防类与响应类能力的优先级排序,主要有短期突发、系统性爆发、长期潜伏三类典型演化形态。

#### 2. 风险影响的根本性

风险影响的根本性指安全威胁对国家主权、民生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利益的损害深度,是判断能力建设优先级的底线标准。国家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或危害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特定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否会发生、怎样发生、发生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都存在不确定性<sup>[35]</sup>。但一旦当安全威胁突破影响的根本性阈值时,往往呈现三个特征。第一,损害对象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意味着一旦受损,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来维持基本运转。第二,破坏效应具有传导性。破坏效应的传导性则体现在,某一安全领域的危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其他相关领域,进而对国家整体安全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第三,修复过程具有长期性。影响根本性的安全危机,因损害深度与系统复杂性,修复恢复往往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因此,在推进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时,需以影响的根本性为重要遵循,对涉及核心利益的安全领域给予高度重视与优先投入。不同领域与核心利益的关联度差异,决定了能力建设需聚焦最根本、最不可替代的需求,从而筑牢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固基石。

#### 3. 风险影响的关联性

风险影响的关联性是国家安全风险复合特征,指安全威胁在不同领域、空间、主体间的联动效应,是判断能力建设优先级的关键维度。在全球产业深度绑定的现实语境下,风险影响之间的关联性呈现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层层递进的传导逻辑,即同一领域内风险可能沿产业链、供应链纵向扩散,不同安全领域风险横向叠加继而形成“风险

集群”,而前两类传导最终必然导致风险突破地理边界形成全球联动,这也是对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传导形态。

判断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需从风险对国家核心利益影响的紧迫性、根本性以及关联性三方面综合考量。将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能避免单一维度决策导致的资源错配或风险漏判,通过差异化能力布局,构建全域覆盖、动态适配、韧性十足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

## (二)不同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适配关系

基于紧迫性、根本性和关联性三维判断框架,结合粮食、资源、科技、数据四大重点领域的风险特质,对其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优先方向进行系统性判定。

### 1. 粮食安全:以战略预防能力为绝对优先

粮食安全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基础性与脆弱性。从三维框架审视:第一,其影响的根本性最强,直接关乎我国14亿多人的生存底线与社会稳定基石,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二,其风险的紧迫性表现突出,国际市场价格异动、主产国突发性出口限制等外部冲击可通过贸易链路快速传导至国内,形成短期内的市场与社会风险,响应窗口有限。因此,对粮食安全而言,最有效的战略是“治未病”,即必须将风险遏制在萌芽之前。这决定了其能力建设必须以战略预防能力为绝对优先,着力提升对全球供需、气候、政策的动态监测力与预警力,并强化以国内产能与储备为核心的自主保障力,把粮食饭碗牢牢端在自己人手中,从源头上规避系统性断供危机。

### 2. 资源安全与科技安全:以战略革新能力为重点突破

资源安全与科技安全在当下面临相似的战略困境。两者的风险特征均表现为:第一,影响的根本性极为深重,关乎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第二,其风险多以长期潜伏、结构性的方式存在,风险影响的紧迫性并非体现为即时爆发,而在于若不破解,将形成对发

展上限的长期锁死与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累积;第三,两者的风险关联性极强,资源是科技的物质基础,科技是突破资源约束的关键手段。破解此困局,依靠被动的防御或应急响应无法治本,根本出路在于主动的突破与代际超越。因此,战略革新能力成为两者的共同优先选项。资源安全需聚焦以关键矿产勘探、集约利用技术为表征的自主可控力与替代适配力;科技安全则需激发原始创新力与技术转化力,旨在通过技术跃迁打破外部封锁,重塑安全与发展的底层逻辑。

### 3. 数据安全:以战略响应能力为首要任务

数据安全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网络性与系统性。第一,其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最高,网络攻击、大规模数据泄露等事件往往以分秒为单位爆发,响应窗口极短;第二,其风险影响的关联性极强,数据作为渗透各领域的神经中枢,一旦失守可瞬时穿透并瘫痪金融、能源、交通等其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引发跨领域的链式反应与风险集群。因此,对于数据安全而言,在加强常态预防的同时,必须将事后的快速止损、态势遏制与风险隔离置于首位。这要求优先建设强大的战略响应能力,重点锻造面对高级别网络威胁的数字防护力和保障业务连续性的冗余备份力,确保在遭受攻击时能快速隔离风险、恢复核心功能,防止单一安全事件演变为全局性危机。

### 4. 各重点领域安全:贯穿重点领域的战略统筹能力

协同考虑粮食、资源、科技、数据四大重点领域,需战略统筹能力。战略统筹能力是贯穿各领域的融合性能力,是超越单一领域、使上述能力形成合力的“融合剂”。如表1所示,它应对的是具备整体性与协同性的重点领域安全问题。无论各领域优先发展何种专项能力,都需要战略统筹能力在顶层进行跨领域资源的科学配置、同步重大行动步骤、平衡长期战略与短期风险。战略统筹能力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支撑性能力,贯穿于所有重点领域能力建设全过程,确保形成国家安全战略合力。

表 1 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

重点领域	核心特征	优先能力	能力需求重点
粮食安全	基础性、脆弱性	战略预防能力	储备调节力、自主保障力
资源安全	关联性、技术性	战略革新能力	自主可控力、替代适配力
科技安全	引领性、创新性	战略革新能力	原始创新力、技术转化力
数据安全	网络性、系统性	战略响应能力	冗余备份力、数字防护力
各重点领域安全	整体性、协同性	战略统筹能力	综合协调力、整体把控力

### 三、新形势下我国若干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提升路径

基于上述优先级判断,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数据安全四大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呈现出与各领域核心特质深度契合的差异化格局,需分领域加强安全能力建设。

#### (一) 加强粮食安全战略预防能力建设

从风险影响的紧迫性与根本性为核心维度的三维判断框架出发,粮食安全领域的国家安全能力应遵循预防能力优先其他能力的排序。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有限、粮食需求庞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立足国内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足国内大循环构建保障生产、储备、流通、消费全链条安全的预防能力,是粮食安全战略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第一,筑牢产能根基,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强化源头防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sup>[30]</sup>。“藏粮于地”是守住粮食生产底线的关键。要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藏粮于技”是突破资源约束、提升产能的核心。要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先进种植技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从源头上增强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坚持以“储调结合+节约减损”拓宽安全纵深。一方面,完善储备调节机制,构建多层次粮食储备体系。我国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粮食储备体系,2024年中央政府粮食储备规模稳定在合理水平。逆全球化趋势下需要进一步

合理确定储备规模和布局,优化储备结构,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调节高效。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节约减损,挖掘“无形良田”潜力。消费环节,我国全面落实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通过开展“世界粮食日”“节约粮食”公益宣传活动,在学校、餐饮场所推行“光盘行动”,有效营造全社会节约粮食的良好氛围。此外,还应加强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粮食烘干、储存、加工等一站式服务,减少粮食在产后环节的损失。

第三,强化粮食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提高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为提升对前述国际资本异动的监测力与预警力,建议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依托已建成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平台,建设“国际粮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专项模块,实时监测粮食生产、库存、进出口、价格等关键指标,及时掌握国际贸易动态,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风险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为国家制定粮食安全政策、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二) 强化资源安全战略革新能力突破

资源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这一战略定位凸显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其战略革新能力建设的关键作用。资源安全自身所带有的关联性特征决定了其风险传导的复杂性和广泛性,隐含的技术性特征要求必须通过独立自主的创新驱动实现资源安全保障能力质的飞跃。针对资源安全领域的战略革新能力建设,需从自主可控力和替代适配力两大核心能力需求出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第一,提升自主可控力,加强关键矿产资源和重要能源的勘探、开发、利用和回收全链条自主化是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sup>[31]</sup>。通过加大地质勘查投入,提高资源勘探精度和效率,发现更多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同时,推动资源开发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资源储

备制度,包括战略储备、商业储备和产能储备,确保在资源供应中断或价格大幅波动时能够迅速响应,保障国家资源安全。

第二,增强替代适配力,积极推动资源替代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提到,要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sup>[32]</sup>。针对我国资源禀赋特点,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非金属矿产等替代资源,减少对传统稀缺资源的依赖。同时,加强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此外,还应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参与全球资源治理、开展资源外交等方式,拓展资源获取渠道,构建多元化、稳定可靠的资源供应体系。

### (三)推动科技安全战略革新能力升级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本质上都是科技实力的较量。科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耦合具有引领性与倍增性特征。纵向维度上,科技安全决定国家安全的层次,只有突破芯片、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才能保障国家科技安全以及数据安全,进而提升国家整体安全水平;从横向看,科技安全覆盖国家安全的全领域。因此,推动科技安全战略革新能力升级,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安全保障体系。

第一,保证安全价值资源与科学价值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对财政预算进行重新配置,显著强化了对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投入,基础研究资源被持续挤压。根据提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26财年预算需被削减55%,从98亿美元降至44亿美元,其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的研发经费降幅超60%<sup>[33]</sup>。尽管最终通过的预算缩减幅度并未达到提案标准,但此种安全价值优先于科学价值的资源配置逻辑会导致科研体系失衡化发展,虽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特定技术突破,却不可避免地削弱科学体系整体的多样性与长期韧性。有鉴于此,我国应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既能响应安全需求又能孕育创新源泉的动态资源配置与治理模式。

第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导的“定向转化”机制。针对芯片、工业软件、高端仪器等最紧迫的“卡脖子”风险领域,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施超常规组织模式<sup>[2]</sup>。具体而言,应由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联合行业领军企业,共同组建实体化、任务型的战略科技转化联合体,将明确的安全需求纵向嵌入从基础研究至产业化的全过程,实行“需求—攻关—验证—应用”一体化推进。其次,应超越建设泛化交易市场的思路,着力发展聚焦战略安全领域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公共服务平台。概念验证中心需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设立,专门对早期技术构想进行技术可行性、工程路径与知识产权风险的快速筛选与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则应由行业领军企业牵头建设,配备从小试、中试到模拟产线的全链条验证环境,并优先承担联合体的中试熟化任务,提供与被替代国外产品对标的“安全可靠验证”服务,实质性地降低工程化风险与成本。

### (四)激活数据安全战略响应能力建设

数据安全是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基石,主要表征方式为保障数据的可用性、完整性、保密性。其贯穿粮食与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科技安全的神经中枢,与国家安全的耦合具有渗透性与关联性特征。同时,数据安全还具有网络性,数据要素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互联互通、流转共享,形成了跨领域、跨区域的网络状数据生态,任一节点的数据安全风险都可能通过网络传导至其他节点。基于此,我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强调各方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对话与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sup>[34]</sup>。

立足风险影响三维分析框架,构建以快速止损与跨域阻断为核心的响应能力是数据安全战略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将企业级的合规机制有机融入并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规制能力,构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内嵌于国家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的主动响应与规制框架,将来源可溯、用途可

控、风险可分级的核心逻辑,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管的国家规制工具。具体而言,第一,依托强制性的全链条数据存证与状态感知技术,实现风险事件的及时定位与溯源,为应对数据攻击奠定基础;第二,通过立法授权的逻辑隔离与流量熔断机制,确保在重大基础设施遭受攻击时,能立即实施跨系统、跨行业的数据流动阻断,防止风险横向扩散形成系统性危机;第三,立足国家级协同指挥平台,将分散于各部门、各行业的监测与处置力量进行整合,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战略响应合力;第四,通过加强革新能力建设持续升级安全技术,确保治理措施与风险形态同步演进,避免因技术迭代导致安全防护体系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提出“国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sup>[35]</sup>,旨在通过战略预防能力、响应能力、革新能力的协同,防范数据风险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性损害。

#### (五)推动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战略统筹力建设

四大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优先级,是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根本性、关联性三维判断框架与各领域核心特质深度耦合的结果。粮食安全以底线防控为核心逻辑,重点在于国家安全预防能力建设;资源安全与科技安全以自主突破为战略导向,均以国家安全革新能力建设为中心;数据安全以应急止损为优先选择,需紧密围绕国家安全响应能力建设。各领域优先级既体现了对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坚守,也彰显了对风险演化规律的遵循,最终通过差异化能力布局,构建起全域协同、动态适配、韧性十足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提供可操作性高、可优化性强的路径选择。

国家安全战略统筹力建设,需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引,积极回应综合协调力与整体把控力两大能力建设需求,以平衡逆全球化趋势下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张力、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动耦合为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其一,统筹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全过程,构建“战略预防—战略

响应—战略统筹—战略革新”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体系;其二,统筹规划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战略布局,立足全国一盘棋与全球视野相统筹的思维,既要强化各重点领域内部能力建设的纵向贯通,也要推动各重点领域间的横向联动。通过系统性统筹构建多维度、多层次能力建设,在逆全球化变局中牢牢掌握国家安全战略主动,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可控、主动有利的安全环境。

#### 四、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三大核心结论:其一,新形势下粮食、资源、科技、数据领域的安全风险已逐渐演变为渗透多个安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综合体,其战略博弈属性显著增强;其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能力作为一个战略系统,包括战略预防能力、战略响应能力、战略统筹能力和战略革新能力;其三,应通过“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根本性、关联性”三维框架判定各领域能力建设优先级,实现差异化判断。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与机同生并存,形势演化的动态性决定了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重点的时态性。新形势下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既是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特定时空语境下具有明确建设导向与差异化特征的核心能力载体,集中体现了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水平。粮食、资源、科技、数据四大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直接关乎国家核心利益与发展全局,本文基于风险影响的紧迫性、根本性与关联性三维判断框架,结合各领域核心特质,构建了“战略预防—战略响应—战略统筹—战略革新”四位一体的能力建设体系,对粮食、资源、科技、数据四大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出了差异化的优化路径。

#### 参考文献:

- [1]张龙林,刘美佳.当前西方逆全球化思潮:动向、根源及纠治[J].思想教育研究,2022(5):119-124.
-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 [3]王逸舟.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几点思考[J].国际安全研究,2023,41(2):3-22,157.

- [4] 阎学通.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 国际问题研究, 2014(5):102-128,130.
- [5] 唐永胜.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途径探析[J]. 教学与研究, 2024, (7):30-38.
- [6] 王秉. 论国家安全能力概念的缘起与内涵[J]. 学术界, 2024(9):151-161.
- [7] 黄大慧, 王月禾. 国家安全能力: 一个过程机制分析框架[J]. 政治学研究, 2025(2):35-51, 175.
- [8] 中共中央宣传部.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8, 23-24, 83, 132.
- [9] 闻言.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N]. 人民日报, 2023-07-13(6).
- [10] 罗必良, 张露.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取向[J/OL]. 改革, 1-11[2025-11-13].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12.F.20251105.1548.008>.
- [11] TANG C, XIE X, WEI G, et al. Exploring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J]. Foods, 2024(13):2272.
- [12] 杨培垌. 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分析[J]. 世界农业, 2013(3):9-11.
- [1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DB/OL]. [2025-12-14].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s/>.
- [14] 国家安全知识百问编写组. 国家安全知识百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92.
- [15] 于宏源. 关键矿产的大国竞争分化、治理困境和中国选择[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5):83-90.
- [16] 国家科技安全知识百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3.
- [17] HOLLNAGEL E. Risk + barriers = safety? [J]. Safety science, 2008(2):221-229.
- [18] 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25-09-29)[2025-11-16].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
- [19]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8.
- [20] 胡剑, 戚湧. 基于区块链跨链机制的政务数据安全管理研究[J]. 现代情报, 2023, 43(9):85-97, 164.
- [21] SUN Liyuan, ZHANG Hongyun, FANG Chao. Date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e: statu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J]. Dat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021, 2(1):41-44.
- [22]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安全白皮书[EB/OL]. (2021-05-27)[2025-11-17]. <https://www.cics-cert.org.cn/etiri-edit/kindeditor/attached/upload/2021/05/27/1b44236fed303bd2864f30cba909421b.pdf>.
- [23] 普华永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平安金融安全研究院. 2018—2019年度金融科技安全分析报告[R]. 北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普华永道、平安金融安全研究院, 2019.
- [24] 希斯. 危机管理[M]. 王成, 宋炳辉, 金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272-282.
- [25]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5(1):18-21.
- [26] 布赞. 人、国家与恐惧: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 闫健, 李剑,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92.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13.
- [2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117.
- [29] 程文银, 李兆辰, 陈劲. 中国式创新现代化与科技自立自强: 自主性引进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4(11):12-22.
- [30] 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662.
- [31] 国家能源局编写组.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4.
- [32] 习近平.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6-14(1).
- [33] 阮佳琪. 被迫众筹搞研究, 顶尖华裔数学家: 要失去对美国信心了, 观察者网[EB/OL]. [2025-09-09].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5\\_09\\_09\\_789505.shtml](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5_09_09_789505.shtml).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EB/OL]. [2025-11-16].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010/t20201029\\_9869292.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010/t20201029_9869292.shtml).
- [35]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EB/OL]. [2025-11-23]. [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6/t20210610\\_311888.html](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6/t20210610_311888.html).